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历史与人的命运

周政保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书系

历史与人的命运

周政保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与人的命运/周政保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9

ISBN 978 - 7 - 5063 - 5990 - 0

I. ①历…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小说评论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3800 号

历史与人的命运

作 者: 周政保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30 千

印张: 14.5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990 - 0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周政保

江苏常熟人，1965年赴新疆，曾供职于洛浦、积田、喀什等地。1972年被新疆大学中文系录取；1980年又被该校研究生系录取。1982年入伍，先后在乌鲁木齐军区等单位任创作员。199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曾出版过《小说与诗的艺术》、《泥泞的坦途》、《精神的出场》、《战争目光》、《非虚构叙述形态》、《苍老的屋脊》、《自尊的独语》、《周政保报告文学评论集》等十几部著作。《非虚构叙述形态》曾被评为第九届解放军文艺奖。在兰州军区工作期间，曾被授予二等功一次。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委员）。

出版说明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历史辉煌，这中间文学批评发挥了应有的特殊作用。

文学批评的繁荣与批评的质量，既受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取决于批评家队伍的集体力量和批评家个人的独特思想与水平。在当代文学批评家队伍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能真诚和负责任地表达自己观点，并能让作家和读者信服与敬佩的批评大家，他们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形成了他们的批评风格，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当代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在文学批评中，遵循文学批评的自身特点和规律，既是这门学科的内在需要，又是繁荣文学和促进文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造，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值此，为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与批评的历程，以及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也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我社特别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当代十余位评论家的作品，这些集子都是他们在自己文学研究与批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无疑，这套规模相当的文学研究与批评丛书，不仅仅是这些批评家自己的成果，也代表了当今文坛批评界的最高水准，同时它又以不同的个人风格闪烁着这些批评家们独立的睿智光芒。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一次精神盛宴，也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由于时间紧迫，本丛书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我只能向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批评家和读者朋友深表遗憾，并致衷心的感谢。

作家出版社社长 何建明

2009年1月1日

目 录

小说的意义：作品与阅读

——兼涉长篇小说《狂欲》 1

与哈捷拉吉里村相关的小说想象

——评陆天明的《泥日》 7

《废都》：废都就是废都 18

关于长篇小说《子民们》的评价与联想 27

关于战争与爱情的故事

——庞天舒长篇小说《落日之战》评述 32

荒诞的历史玩笑

——张抗抗长篇小说《赤彤丹朱》读记 38

《末日之门》印象 42

战争不是“游戏”

——朱秀海《穿越死亡》读记 51

《马桥词典》的意义 59

口语倾诉的方式（或叙述就是一切）

——关于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74

《务虚笔记》读记 87

陈染的烟雾

——读《私人生活》小札 99

寻找“石头油”的故事

——长篇小说《黑白》读记 102

《木凸》的“木凸木凸木凸” 106

历史或命运的无奈

——关于长篇小说《太阳回落地平线上》 109





《驼城》的“大盛魁掌柜”	112
“落不定的尘埃”暂且落定	
——《尘埃落定》的意象化叙述方式	120
重读张贤亮的《习惯死亡》	129
影子是重要的	
——关于斯妤的长篇小说《竖琴的影子》	138
《高老庄》：超越叙述对象	144
《英雄无语》：“无语”的意义	149
《黄羊堡故事》：恍若隔世的历史记忆	157
从茫然摇曳到绝望变态	
——读《摇曳的教堂》	160
谁能或怎样才能摧毁那方“水土”	
——我读毕四海的《财富与人性》	163
《大浴女》：谁在塑造她们？	167
生命与历史同行	
——洪三泰的长篇小说《风流时代三部曲》	170
“怀念”的是“狼”么？	
——读长篇小说《怀念狼》	174
那一垄垄长满大豆高粱的土地	
——关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	177
在爱情成为笑话之后	
——读池莉的长篇小说《小姐你早》	180
独树一帜的“第三条道路”	182
怎样才算“好小说”	
——或从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秦相李斯》说起	185
《大风起兮》：辉煌中的沉重	188
“撤退”及写好“中国小说”	
——谈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	191
《痛失》的意义	195
于荒诞中见人生本相	
——读张炜的《能不忆蜀葵》	198
《白太阳》：爱情不仅仅是爱情	200

历史变化与人的感情遭遇

——从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说起 203

铁血军人今犹在？

——评马晓丽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 210

历史与人的命运

——查舜的长篇小说《青春绝版》 213

“标新立异”与表现力

——谈李锐的《银城故事》 216





小说的意义：作品与阅读

——兼涉长篇小说《狂欲》

我本想在这篇文章中使用“文本”这个概念，但无奈这个概念虽然时新而含意模糊——它在各种批评学理论中的理解及运用，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于是我就仍然使用“作品”这个概念：譬如，作为长篇小说，刊载于1989年《百花洲》第3期的《狂欲》就是一部“作品”。

按照常规思维的逻辑，小说的意义是经由作品而获得实现的，或者说，小说的意义只能被体现于具体的小说作品之中。诚然，如果被称为“作品”且堂堂皇皇地刊载于文学杂志，那一般来说，它总具备某种特定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具备某种特定的文学价值），但这里的重要问题是，一个作者依据他所操持的生活观念与文学观念而写了一部“小说”，那应该由谁来认定它是一部“作品”呢？毫无疑问，应该由包括文学杂志编辑在内的读者来认定。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作品”可能体现一部小说的意义，但这种可能性归根结底还要通过社会阅读来验证。倘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小说的意义，必须在进入社会阅读之后才可能实现；反之，任何小说都不可能产生意义。

不言而喻，社会阅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且不说阅读某部作品时的特定心境，以及与这种心境相关的时代崇尚与历史氛围的差异性——譬如说读短篇小说《班主任》、《李顺达造屋》之类，即使是处在同一时代崇尚或历史氛围之中的读者面对同一部作品，也可能因每个读者的不同身份或不同文化修养而截获不同的感受或不同的体验或不同的判断与印象……这是毫无办法的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及人的艺术感觉的历史发展时说：“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所以马克思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



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在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

马克思的精彩论述，实际上也在告诉我们——阅读（或接受）之于作品意义的重要性，或者说，只有阅读的过程才可能实现作品的意义——倘若读者的感觉（或文学感受能力及其理解可能性）偏离了正常的审美轨道，那作品的意义也就可能被扭曲、被损害、被牵至远离作者初衷的方向。甚至还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即明明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但在一些人的阅读印象之中，却被认定为“毫无意义”。所以鲁迅说革命家在《红楼梦》中看到排满，而道学家看到的则是淫秽，这尽管是一种嘲讽，但其中的意思倒是很逼真地道出了阅读领域中的差别。

在我的观念之中，作品的意义——或者说是一部小说的价值，完全是相对具体而生动的社会阅读而言的。一部自以为很出色的小说，如果始终不进入社会的阅读领域，那这部小说也就不可能产生意义——阅读是小说之所以具有某种意义的土壤；而这块“土壤”又绝非是一种抽象的假设：它是由一个个具体读者组合而成的活生生的存在。

我在这里要涉及小说家张品成的一部作品，即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长篇小说《狂欲》——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在去年下半年的《文艺报》上，专业评论家林为进曾作过比较公允的正面评价，而在今年年初的《百花洲》上，舒畅则撰文作了题为《欲壑中的迷失》的否定性的评价（无疑，这里的评价都是善意的同志式的各抒己见）。从这些很不相同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到，个体阅读之于小说的意义、即对小说价值及其思情走向的判断或认同，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从这种不可避免的差别性之中，还可以发现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文学作品的阅读，其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说穿了，即读者应该怎样阅读作品（“应该”这个词可能有点儿武断，但从马克思的关于艺术感觉的历史发展观点来说，“文学欣赏”毕竟具备某种内在的审美规律性，而其中的奥秘则与欣赏音乐或欣赏美术作品是一致的）。

一部文学作品在复杂的社会阅读过程中必然地被“改写”——这种发现于今天的接受美学领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了。譬如说，二十世纪的荷马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而是我们的（或作为个体的“我的”）



荷马，而莎士比亚也决计不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已经成为我们的莎士比亚了！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读者创造了不同的荷马与莎士比亚，并从中找出不同的思情成份或艺术因素而从事不同的判断与评价，这种现象之于作家作品，既是悲哀的，又是可喜的，因为这种阅读过程中的无意识的“改写”，也许可能违背或远离作家作品的“初衷”，但也可能因种种“改写”而使作品滋生相对恒久的艺术生命力——马克思曾高度称赞过古希腊艺术的永恒魅力，而这种永恒魅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则可以归功于历代欣赏者的“改写”。当然，这种“改写”肯定受制于历史文化氛围的牵引。所以，曾经写过《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英国理论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说：“任何作品的阅读同时都是一种‘改写’。”又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流行评价，可以被直截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在其过程中不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是无意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被当作文学的事物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事件的原因之一。”（见伊格尔顿所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依据这种比较可靠的观点，那在不同读者的不同阅读过程中，就一部小说而产生某种感受与理解方面的分歧，也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学接受现象了。不过，这里不包括那种“故意改写”的情形，譬如康生对于小说《刘志丹》的“改写”、姚文元对于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改写”等等，因为他们的“改写”所导致的“判断”，早已超出了文学欣赏或文学批评的范围，而属于一种包藏卑劣政治用心的反动杀机的无耻运用。所以我所强调的，仅仅是那种自然而然的文学接受现象，那种正常的小说理解及审美感受方面的分歧，以及那种因分歧而导致的对于小说意义的不同判断与不同评价。

但无论如何，当我们阅读一部被称为小说的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应该意识到的是：你的对象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产品——它不是被严格逻辑统治着的理论文章，也不是通讯报道之类的新闻文字，更不是政府部门的文件材料：它是小说，而小说的任何方面的社会效果都是经由小说方式的审美实现的；如果它是非审美的，或者说，它缺乏应该具备的审美作用，那诸如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启迪作用之类的可能性，必然是一种空谈或一种妄想。我以为这是文学世界的最起码的常识。

张品成的《狂欲》到底是一部怎样的长篇小说？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而作为小说的意义，作品又是如何传达的？在这里，我既不想全盘



否定这部小说，也不想把这部小说说成很优秀或很杰出的作品——我只想说，这是一部有意义的小说：尽管作品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某些思情艺术方面的缺憾，但作品所体现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探索不易，成功更难，因而不能因作品的一些性描写而论定它的“迷失”。实际上，《狂欲》的总体题旨是比较自觉的，而性描写大体上仅仅是一种传达或表现的途径（这方面的描写是否显得多余，或有点儿画蛇添足的嫌疑，评论界还可以讨论）。关于性描写，文学界与非文学界早已发表过很多精彩的或不甚精彩的见解，或者说，就一般理论逻辑而言，应该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即都以为文学创作并不排斥性描写，关键是怎样描写与描写的目的是什么。但一进入具体的创作与阅读之后的把握，问题就显得相当复杂与相当烦难了。对此，创作界与评论界都具有难言的深切之感。

我读了《狂欲》之后，所留下的第一艺术印象是——这是一则结构不甚严密的长篇寓言，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具备一种隐隐约约的寓言倾向。如果仅仅从作品的背景、从作品的表层描写、从这种描写与生活原生面貌的接近程度、或者是从一般的“性”的与“欲”的角度来感受与理解，那就可能偏离作品所包孕的真正思情意图与艺术探索目标——当然，如果出现这种阅读情状，那也不可把责任全部地推向小说之所以可能产生意义的社会阅读，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部作品也存在着自身的缺憾。

我之所以说这部小说具备某种寓言倾向，那是因为这部小说——所描写的虽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农村生活，但作品真正企图表现的，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农村文化现象，一种阻碍生存与繁衍的封建伦理观念的虚伪与反人性实质（一方面是农民因沿袭传统文化负面而滋生的愚昧落后，一方面则是与农民相敌对的反动阶级的阴险残忍）。无疑，这一切基本上是由以洪迈为代表的一族人的生存欲望、生理欲望、复仇欲望、宗族延续欲望的强烈冲撞与奔突中实现的，而在这种“狂欲”之中自然渗透了作者的社会变化剖析。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那些丑陋的性描写，也不可能是一种自然主义或纯粹生理性的揭示与展览。十分明显，性描写之于作品整体，不是一种津津乐道的“欣赏”，而是一种滴着血泪的控诉，一种蒸腾着苦涩气息的批判——还应该指出的是，作者不是在嘲弄这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而是在控诉与批判一种浸透了封建伦理道德与迷信的宗族文化。这种宗族文化作为小说描写的缩



影——尽管小说的故事不甚复杂，但它痛苦地体现了一种惨酷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它模糊（作为艺术描写）而清晰（作为艺术表现及思情走向）地告诉读者——革命的失败、瘟疫的流行、敌对阶级的猖狂残酷，都不可能灭绝一个宗族的生存与延续（它们只可能摧残这种生存与延续），而真正可能导致悲惨结局的，则是宗族内部早就存在着的封建文化传统及其那种迷信所生成的愚昧落后：作为一种自戕因素，它在特定的环境中恶性膨胀而铸造灾难。

我觉得，这就是《狂欲》这则“长篇寓言”所隐含的意义——特别是，作品的描写之于其中贯突的“狂欲”，所融入的批判态度是可感可触的。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迷失自己的描写与表现，以及这种描写与表现所寻觅的整体思情走向。在这里，分歧最显著的，大概是作品中所留下的那些情欲描写、特别是那些男女交媾场面的比较细致的揭示，但就我的阅读感觉而言，还不能轻率地认定这些描写或揭示都是纯粹的生理欲望的宣泄——全部这样认定是不公允的，因为在小说中，无论是族长洪迈的动机，还是其中的那些男女主人公的种种“狂欲”的产生，都被打上了相应的体现某种社会文化色彩的烙印，当然，我也不能说这些“狂欲”的描写场面，一点儿也不存在生理性欲望的宣泄成份，但叫人感到烦难的是：无论小说家还是评论家，都很难不容易从中作出明明白白的区别——作为人类生存的具体内容，“性”的描写之于小说，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众所周知的：但究竟怎样描写才富有意义、才具备文学的审美价值，这正是我们应该不断探索的课题——尽管谁也拿不出尽善尽美的灵丹妙药，但也不必发出莫名其妙的惊呼……如果以为《狂欲》的描写具有所谓的“抹黑”嫌疑，那就有点儿冤枉作者的一片苦心了。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而是一部以农村文化现象作为描写内容的富有寓言倾向的小说——这样阅读，对小说的意义也许可能产生一种比较可靠的感受与理解。我想，对于这部小说的肯定与否定，或肯定一部分与否定一部分，大概都可以作为个体阅读的结果而存在，但重要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合乎小说艺术规律的判断。

我的这篇短文是因《狂欲》而萌生的：我再一次感到了阅读的重要：阅读是第一性的、作品是第二性的，这种说法绝非毫无根据的妄论——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以可靠的方式阅读小说，从而避免对于小说意

义的高估或低估（或偏离）。不过，我在文章中涉及到了《狂欲》这部小说，所述也只是我的阅读结果，至于可靠与否，则是另一回事，好在社会主义文学园地里所倡导的是“二为”前提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凑巧的是，这部小说所刊载的杂志就叫《百花洲》！

1990年3月





与哈捷拉吉里村相关的小说想象

——评陆天明的《泥日》

创作了《桑那高地的太阳》的陆天明，现在又有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泥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泥日》与《桑那高地的太阳》是两部不同的小说，但因了叙事背景的某种接近或相通，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能够从这两部不同的长篇小说中发现某些微妙而共同的审美因素，如那些从作者的生活经验中蒸腾起来的精神探索，那些“忧国忧民、忧史忧文、忧斯民更忧人类”的独特思考，那些由沉痛的历史感受结晶而成的对于生存或对于理想的洞观与理解。毫无疑问，陆天明尽可能地利用了他所拥有的文学想象力，以及那种充分发挥虚构才能的机会，以至于经由《泥日》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陌生化效果的生活世界，以及这个特别的生活世界中一群永远处在登场与退场之中的人，一群传奇色彩浓重但又让你感到可信的人，一群不断向生活挑战又不断向生活屈服或告饶的人，一群正经死去或仍然活着的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被陌生化了的世界，却是一个令人感到熟悉的世界，一个经常活跃在我们回忆中的世界。

这便是《泥日》。一部苦难的生存史，它是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或一部包含了奋争与覆灭的生存史，它是一种“人的现实”，一种独特的社会人性的“博览”。《泥日》自然与陆天明的生活经验相关，同时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或很多人的生活经验相关。它是一种人的生活经验的沉重回顾，一种体味了生存的苦涩之后的思情释放。它描写了一个奇异神秘的“边疆世界”，而这个“边疆世界”的独特性，以及其中的鲜为人知的人文风景与传奇经历，也使小说的描写生长出一种苍凉，一种广袤，一种严酷，一种寓深长之意的可能性。但小说构造中所涌动着的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汐与社会人性力量，又时时使我们领悟到，这个“边疆世界”不仅仅是地域文化意义上的“边疆世界”……



《泥日》中的“边疆世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只能由小说中的人物来回答。

我们先说肖天放。

人物刻画之于小说，虽然只是途径或手段，但就一部具体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来说，假如没有几个富有意义（或意味或意趣或意思）的人物活跃着与贯穿着，并以此而撑持全局，那小说的审美可能性是没法实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的人物刻画，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艺术标志。《泥日》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可谓各色人等，应尽应有。但在《泥日》中，真正贯穿始终的人物却不多，重要的人物只能数出三个，即肖天放、朱贵铃、宋振和。其他人物不是“半途退场”，就是“半途登场”，如联队参谋长、白老二、大来娘、迺发五、苏丛、泗洋、肖大来、那旅长等等。作为长篇小说的一种写法，我们暂且不论其长短高低，但这种走马灯一般的人物结构秩序，却在客观上（意外地）突出了贯穿性人物于艺术刻画上的显著地位，因而也较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肖天放就是如此。当然，肖天放这个人物的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于他作为结构的必需而始终活跃在小说中，同时也在于因了这个人物的贯穿才使这部小说的意义获得了实现。

“哈捷拉吉里”——翻译成汉语就是“监狱长”——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地名！肖天放生于斯，长于斯，苦难于斯，威风于斯，最终也灭顶于斯。肖天放与这座“哈捷拉吉里村”是永远连结在一起的：哈捷拉吉里决定了他的命运，而哈捷拉吉里的命运也与他相关。肖天放的忍耐与奋争：他的成功与失败，他的辉煌与衰落，他的生命旅程所划出的闪烁而终于淡去的轨迹，是一道滴着血泪的弧线。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可能充当的，是一名饮够了人间辛酸的悲剧演员：他只能演悲剧，而难于担当喜剧或正剧的角色，因为他仅仅是哈捷拉吉里的后代。这不是宿命论或命定论，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结局，一种冥冥之中被规范的果实。肖天放是历史的体现，是人的生存本能或人性力量的具体化；他是人，也是历史，但被打上了烙印；他的血液与众不同。这就涉及到了《泥日》的意义。

肖天放虽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迹痕，但肖天放又是一个“小人物”，一个社会底层的苦难劳动者。所以他只能经由自己的方式体现恩赐的或狰狞的历史面目。历史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不仅仅是那些载入了史